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AMI) 集刊核心

PEKING UNIVERSITY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北大政治学评论

(第19辑)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主办

燕继荣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政治学评论. 第19辑 / 燕继荣主编.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25. -- ISBN 978-7-100-25860-9
I. D0-5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5NQ9645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北大政治学评论

(第19辑)

燕继荣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5860-9

2025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2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118.00元

Contents

National Security

Zhang Biao	The Impacts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n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UK Conservative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s China (2021 – 2023)	3
Wang Ziyuan Yan Liya	The Drivers and Evolution of U. S. Digital Hegemony and China's Response	25

Public Governance

Liu Lun Shi Fangchen	The Limit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s Influence on Public Decision-Making and the Transcendence from a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45
Zeng Yang, Shang Junying, He Zengk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ligent and Clean Government: A District and County Level Study	61

Political Thoughts and Institutions

- Tan Yuheng Spirit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Rule of *Li*: Reducing the Meals of the Son of Heaven in Han Dynasty 91
- Ma Mengmeng *Shengsheng-Minben* as the Principle of Order Construction: *Daxue-yanyibu*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Minben* Political Theory 117
- Tan Ruijie Between Potentiality and Actuality: On the Dual Form of Agamben's Sovereignty 136
- Gu Chao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Medieval Power Struc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153

Comparative Politics

- Ma Zhenhao From Patterns of Democracy to Patterns of Popu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pulism in Europe and America 179
- Jiang Guangming The Recession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A Typology and Its Mechanisms of Occurrence 212

Overseas Contribution

- Andreas Wimmer Nationalism and War: A Macro-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35

Book Review

- Li Haosheng Oakeshott's Understanding of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of Oakeshott's *Hobbes on Civil Association* 257

Appendixes

- Invitation Letter f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3
- Editorial Style Guide of the *PKU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4

海外译稿

Overseas Contribution

民族主义与战争：宏观比较的视角^{*}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 撰 高昕阳 译 杨端程 校^{**}

摘 要：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大多数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与战争如影随形，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民族主义被视为战争爆发的副产品或动员工具。本文主张，民族主义不仅是战争的核心动因，更是在过去两百年间全球范围内大量暴力冲突（包括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根本解释因素。通过分析宏观历史数据，本文揭示了冲突的“双波模式”：第一阶段，帝国主义的扩张导致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第二阶段，民族主义的兴起挑战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大量的分离主义战争和国家间冲突。通过两个当代案例，本文进一步阐释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排斥如何导致内战，以及跨境族群问题如何引发国家间冲突，并认为民族主义引发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通过权力共享、同化等路径解决族群不平等问题。

关键词：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双波模式；民族国家

Abstract: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the modern worl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most countries, its rise has been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war, shaping

* 本文经作者安德烈亚斯·威默 (Andreas Wimmer) 教授授权，介绍了其于 2024 年 12 月 8 日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所作题为“民族主义与战争：一个宏观比较的视角” (Nationalism and War: A Macro-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学术讲座的主要观点。本文注释 (包括脚注、图下注、表下注) 均为译者注。

** 安德烈亚斯·威默，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哲学教授，其研究采用长期历史和全球比较视角，探讨国家建构与民族的形成、族群边界与等级制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考察族群战争的冲突机制；高昕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杨端程，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raditionally, nationalism has been understood either as a byproduct of war or as an instrument of mass mobiliz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instead that nationalism should be seen not only as a catalyst for war but also as a fundamental explanatory factor behind violent conflicts—including civil wars and interstate wars—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Drawing on macro-historical evidence, the study identifies a “double-wave pattern” of conflict: the first wave was driven by imperialist expansion and large-scale wars of conquest, while the second emerged from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movements that challenged imperial rule, giving rise to separatist wars and interstate rivalries. Two contemporary case studies further demonstrate how ethnic political exclusion within nation-states can generate civil wars and how cross-border ethnic ties can trigger interstate conflic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emphasizing that wars fueled by nationalism are not inevitable; mechanisms such as power-sharing and assimilation provide viable pathways for mitigating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conflict.

Key words: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War, Double-wave pattern, Nation-state

一、引言

民族主义与战争议题长期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学术地位。民族主义通常仅被视为国家进行战争动员的工具性手段，而非影响战争爆发的核心解释因素。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观点：民族主义仅代表了国际政治秩序中的次要力量，因为其大多由国际安全竞争导致，是动员大众支持国防的工具。因此，民族主义被简化为可由政治精英操纵以进行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工具，进而贬抑了其作为独立解释变量的价值。

现有比较政治学对内战(civil wars)的研究也倾向将民族主义看作“动员工具”。该领域的主流研究认为：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话语(ethnic nationalism)往往被反叛者策略性地使用——如通过宣称“群体代表性不足”或“受系统性压迫”来合理化其抗争行为；然而，这类话语往往掩盖了反叛者的真实动机，即资源争夺(如对石油、矿产等经济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权力诉求(对

中央政府权威的直接挑战)等。在此分析框架之下,民族主义仅扮演着“动员工具”的修辞角色。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涵与认同政治的实际影响遭到了系统性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角无法完全解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某些经验事实。例如,部分学者通过跨国战争联盟的案例论证这样一种现象,即国家间可能因族群—民族纽带(ethno-national ties)而形成特殊的战时同盟关系。^①即使在战争中,国家之间的联盟也可能受到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实际上会支持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拥有共同族群或民族纽带的交战方。这表明,民族主义不仅是政治动员的工具,其内在的认同逻辑亦能独立形塑冲突的生成。

尽管在以上理论图景中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但从总体上看,民族主义往往被边缘化为战争的非核心因素。无论是国家间战争还是国家内部的战争,将民族主义视为现代世界的战争因素并不是一种突出的做法。但近年全球政治的现实迫使学术界重新审视这一观点。特别是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莫迪(Narendra Modi)等坚定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的崛起,民族主义被带回至全球政治的前沿。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这两大当代冲突中,民族主义作为战争直接诱因的趋势尤为凸显。

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加强。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与战争如影随形,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民族主义被视为战争爆发的副产品或动员工具。威默主张,民族主义不仅是战争的核心动因,更是在过去两百年间全球范围内大量暴力冲突(包括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根本解释因素。^②这也是后文将展开详细论证的核心观点。

① 这些研究关注国家如何进行军事干涉以帮助邻国同胞。可以参见 Miller, Benjamin, *States, N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War and Pea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aideman, Stephen M. & Ayres, R. William, *For Kin or Country: Xenophobia, Nationalism,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Woodwell, Douglas, *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s, Foreign Policy, and Enm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② 参见 Wimmer, Andreas,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目前该书已有中文译本,参见[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战争之波: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与族群排斥》,杨端程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战争的原因

权力(power)与合法性(legitimacy)是分析政治生活的核心维度。政治权力体现为对政府控制权的争夺；政治合法性则是支持权力主张的理念基础，其核心功能在于解释统治资格的正当性。从理论上说，权力的争夺与合法性的构建共同构成了战争的两大根源。第一类战争源于常规性的权力斗争，包括军事政变与反政变、选举失利后的暴力夺权、王朝继承战争等现实政治冲突；第二类战争则更深层，更具破坏性，它围绕政治基本原则与权力合法性展开。当不同群体对“谁有权统治”这一根本问题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这种冲突更容易升级为全面战争。其原因在于，这类合法性之争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被压制的群体完全丧失政治参与的正当资格，进而形成一种零和博弈的局面。在这种刚性对抗中，妥协空间被彻底挤压，暴力往往成为唯一出路。

下文将聚焦于上述的第二种合法性斗争。它是关于政治制度规则的原则性斗争(principled struggles)，并在过去两百年间深刻形塑了全球政治格局，其中的某些关键斗争甚至对全人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分析将始终秉持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以理解这一进程。在广泛、全面且具有比较意义的视角中，诸如中国这样的主要大国与瑞士、博茨瓦纳等中小国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场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斗争源于帝国意识形态(imperial ideologies)的兴起。该意识形态声称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种族或文明优越论之上，即认为被统治族群在本质上是低劣的。这套合法性话语成为所有帝国的根本统治原则。受此驱动，近代帝国版图急剧扩张：这一序幕首先由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帝国与西班牙帝国拉开；继而登场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随后是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等西欧殖民势力及俄罗斯帝国——它们分别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延伸；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帝国亦加入了这场全球范围的帝国竞逐。

第二场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源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兴起。作为一种反帝原则(anti-imperial principle)，民族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异族统治的正当性。它主张一种民族自决原则(self-rule)，即每个国家应由其所属族群的成员执掌政权。根据这一逻辑，任何异族统治——无论是英国对尼日利亚的殖

民，还是奥匈帝国对罗马尼亚语族群的管辖——均丧失合法性。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民族国家模式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迅速兴起并遍及全球，最终取代帝国体系及其赖以维系的帝国意识形态。

诚然，这两种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互渗透的现象。典型的例证如 20 世纪初兴起于英国和德国的“帝国民族主义”（imperial nationalism），尤其是纳粹德国试图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此外，也有帝国采用民族主义原则的情况，例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曾试图借助民族主义思想来维系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然而这些局部的调和尝试，并不能改变帝国与民族主义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根本对立。两者的分歧在于对“统治权归属”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帝国主张跨族群的等级制统治，而民族主义则坚持族群内部的自决原则。

除帝国与民族主义的对立外，历史上还存在着其他关于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争论，如民主化运动与共产主义革命。这些斗争虽然同样围绕着“谁有权统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但其影响范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与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帝国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不同，它们并未普遍影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民主化运动在某些国家从未出现，而共产主义革命也只在部分国家形成重大变革。

本文的核心关注点，即帝国与民族主义的对抗性动态，实际上是近现代历史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现象。它们几乎席卷了全球各个地区，仅存在极少例外情况。从历史发展时序来看，这两股力量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帝国体系率先确立，随后民族主义浪潮接踵而至，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主导着世界各地区的政治格局。这种帝国与民族主义交替演进的过程，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冲突的“双波模式”（double-wave pattern of conflict）。这一框架为理解近现代世界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的复杂图景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为了验证上述观点，威默与合作者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数据集。^① 在方法上，选择以现存国家的固定地理疆域作为分析单元，而非仅关注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时段。以加纳为例，尽管该国直至 1957 年才实现独立，但数据记录可回溯至 19 世纪初殖民统治时期的状况。这一方法扩展同样适用于全球其他国家。

① 关于数据集细节，参见 Wimmer, Andreas & Min, Bria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 No. 6, 2006。

在方法论层面,采用连续性领土单元(continuous territorial units)的观测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若沿用传统做法,即仅以主权国家为观测单位(如现有大多数数据库的常规处理方法),会导致加纳独立前的所有战争冲突被系统性遗漏。这种选择性偏差无法完整呈现民族国家独立前后的连续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冲突“双波模式”的呈现。通过确立以固定地理空间而非变动政治实体为基础的观测对象,既能确保前殖民时期战争冲突的完整呈现,也为理解更宏观、长时段的历史动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因此,在确定了两个关键的制度转折点(institutional turning points)后,这些转折点前后的战争频率便成为本文接下来要分析的对象。一是帝国扩张节点,即表现为特定领土被强制并入帝国体系的时间点。仍然以加纳为例,数据精确记录其主体疆域被大英帝国兼并的具体年份,这一节点标志着发生了原有政治制度被纳入帝国体系的根本性转变。二是民族国家形成节点,即以政治独立与宪法颁布为标志的制度转型时刻。该节点通过确立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原则,承认民族是合法权力的主权来源,不仅否定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与神权政治(theocratic systems)及部落联盟(tribal confederacies)区别开来。

在多年的历史案例中,上述两个制度转型节点表现为明确而剧烈的变革。典型的例证包括1821年墨西哥的独立战争、1831年的比利时的独立、1957年加纳的独立等。在这些案例中,制度的根本性转变都能被精确地界定到某个年份。然而,也存在若干例外情形,部分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完成制度转型,具体表现为:王朝统治阶层逐步扩大议会权力,或通过多次宪法修订来实现政体变迁。例如,英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尤其是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难以被界定为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针对读者——特别是对实证分析经验较为有限者——可能存在的疑问,需要就核心方法论特征作出说明。构建数据集以领土而非政治实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这一处理方式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数据集不直接编码大英帝国这类帝国整体,而是将其下辖的英国本土、加纳、博茨瓦纳、南非等具体领土作为独立记录单元。这种选择背后的考量在于:通过围绕领土而非政体构建数据集,避免了帝国和民族国家相互排斥的假设,从而能有效捕捉特定地区在政治统治关系更迭中的制度延续与断裂现象。例如,1920年的数据显示,此时的英国本土已被编码为民族国家,而同属英国殖民体系的加纳则被明确标记为受帝国统治的状态。

这项数据集的构建历经研究者严谨繁复的工作。为确保数据的全面性与可比性，研究者系统性梳理了1816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各类战争记录，整合了多个现有战争数据库，并采用学界通行的战争冲突判定的阈值标准，将每场导致至少1000人阵亡的武装冲突纳入分析范围。通过对数据集的分析，结果直观呈现出了一种冲突的“双波模式”，验证了上文提及的一些观点（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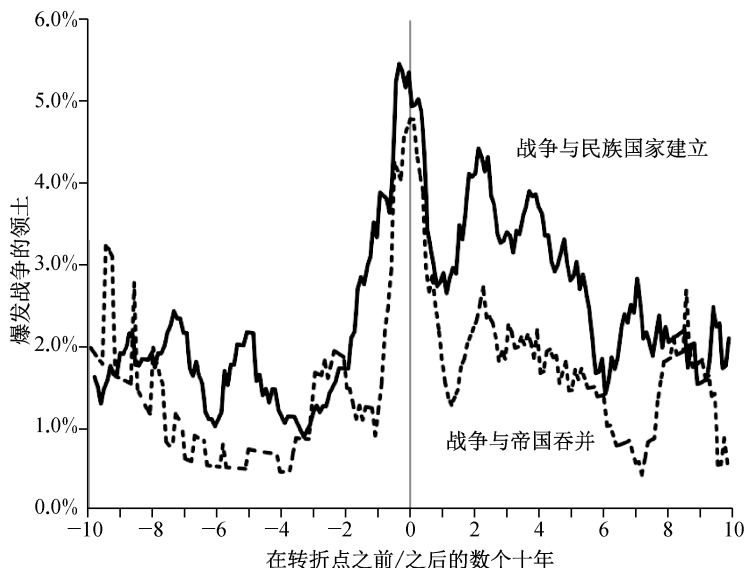


图1 相对于帝国吞并与民族国家建立的战争比率（平均间隔十年）

注：相关资料由作者提供，并参照中译本，参见 Wimmer, Andreas & Min, Bria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 No. 6, 2006;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战争之波：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与族群排斥》，杨端程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34页。

在图1中，垂直线标识了两个关键制度转型期：横轴零点左侧表示转型前的数十年，右侧表示转型后的数十年。其中，零点对应着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制度变迁节点：第一，领土被并入帝国统治体系；第二，从帝国统治转变为民族国家。结果显示，战争发生概率的变化趋势与研究预测高度吻合。在这些制度转型期，战争概率从基准水平的2%左右骤增至近6%。这一现象表明，在这一阶段往往伴随着关于统治合法性的激烈冲突。不同群体对领土治理模式及其合法性基础存在根本性分歧，这种矛盾往往导致政治对立的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

三、第二波浪潮：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战争

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主张国家统治权应当源自具备民族身份认同的全体成员所形成的集体意志，而不是来自某个特定王朝的血统（如哈布斯堡王朝或罗曼诺夫王朝）。同时，民族主义也与神权政治（theocracy）相对立，拒斥统治者通过宗教权威获得合法性（如自诩“上帝旨意的诠释者”）。民族主义反对帝国统治，质疑帝国以文明优越性论证其领土扩张的正当性。

通过建立“同类相治”（like-over-like principle）的原则，民族主义否定了异族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支配（如多语族帝国中的统治模式）在道德和政治上均具有缺陷，主张具有共同语言文化特征的群体（例如德语族群、罗马尼亚人）应实现自我统治。当这种“同类相治”原则被违背时，政治体制就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危机的深化，往往催生新兴政治势力对抗旧政权。在遭遇既有权力结构压制的情况下，暴力革命便会成为重塑政治版图、实现民族自决诉求的终极手段，使之符合“同类相治”原则。

在初始阶段，民族主义否定族群与种族等级制度（ethnic and racial hierarchies），逐步消解多元帝国维持统治的正当性。这一过程直接催生了以“同类相治”为诉求的分离主义战争（secessionist wars）。民族主义者通过武装斗争试图建立独立政治单元的行动，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前夕达到了历史峰值。当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因民族自决引发的暴力事件呈断崖式衰减。这种规律性的消长关系的根源是：相较于容纳了多族群的帝国统治，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更易于实现“同类相治”原则，进而缓解导致暴力升级的合法性危机。

当国家完成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后，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也会让政权难以合法地排斥少数族群（political exclusion of minorities）。这种族群排斥与“同类相治”原则自相矛盾，形成一种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即对内的压迫性统治。由此引发的矛盾可能会升级为非分离型内战（non-secessionist civil wars）。核心问题是：在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中，究竟由谁掌握政府控制权（who controls）？谁具备代表国家的资格（who represents）？谁拥有统治的正当性（entitled to govern）？因此，围绕民族边界的斗争（struggles over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将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的第二次转型阶段最为频繁。

此外，新兴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政治不平等(ethno-political inequality)常具有外溢效应，往往会牵连邻国，尤其是在跨界族群聚居的区域更为明显。典型的情形是：某个族群在本国作为主导的多数群体(dominant majority)，却可能在其主权边界之外沦为被统治的少数群体(dominated minority)。此类状态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当此类跨境族群在邻国遭受政治排斥时，其母国政府往往动用民族主义话语对于干预行为进行合理化，通过支持境外同族诉求以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关于跨境族群的紧张局势，极易转化为国家间的军事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对峙双方可能进一步诉诸领土边界的修正，主张通过边界调整实现“同胞回归”——将地理边界扩展至境外同族的聚居区，从而形成所谓的“让同族回归祖国”(bringing the co-ethnics home)。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空间重塑诉求，成为当今许多冲突爆发的重要诱因。因此，国家间战争很可能在民族国家形成前后不久发生。这种现象被迈伦·韦纳(Myron Weiner)称为“马其顿综合征”(Macedonian Syndrome)。^① 作为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的马其顿^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次身处巴尔干战争漩涡的中心，保加利亚、希腊和南斯拉夫围绕民族归属的争议导致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军事对抗。这便是由于跨境族群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典型代表。

随着民族国家形态的确定，发生征服战争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种转变源于统治逻辑的根本转换：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逻辑被民族主义的逻辑替代。在现实政治中，现代民族国家缺乏扩张领土、吞并他国的动机。即使出现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那样的极端情况，攻击方的目标也仅限于政权更迭(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政府)，而非将其领土纳入联邦体系。征服战争意味着强制兼并其他民族的领土与人口，这与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产生了根本冲突。

为分析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战争类型，威默及合作者根据战争发起者的目标对战争进行了编码。^③ 基于对参战国目标的历史考察，战争被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见图2)：(1)征服战争(wars of conquest)：其目标是将他国领土

① 参见 Weiner, Myron, "The Macedonian Syndrome: An Histor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orld Politics*, Vol. 23, No. 4, 1971。

② 因与邻国希腊长期存在历史纷争，该国在2019年2月12日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

③ 参见 Wimmer, Andreas & Min, Bria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 No. 6, 2006。

和人口永久地并入本国的统治范围(国家间战争);(2)均势战争(balance of power wars)(国家间战争):其目标并非征服,而是提高本国的相对地位,确保外交政策利益得以实现(国家间战争);(3)非分离主义内战(non-secessionist civil wars):其目标是在国家内提高特定群体的权力地位,在既定结构中获得权力(国内战争);(4)分离主义内战(secessionist civil wars):其目标是从现有国家中脱离,并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国内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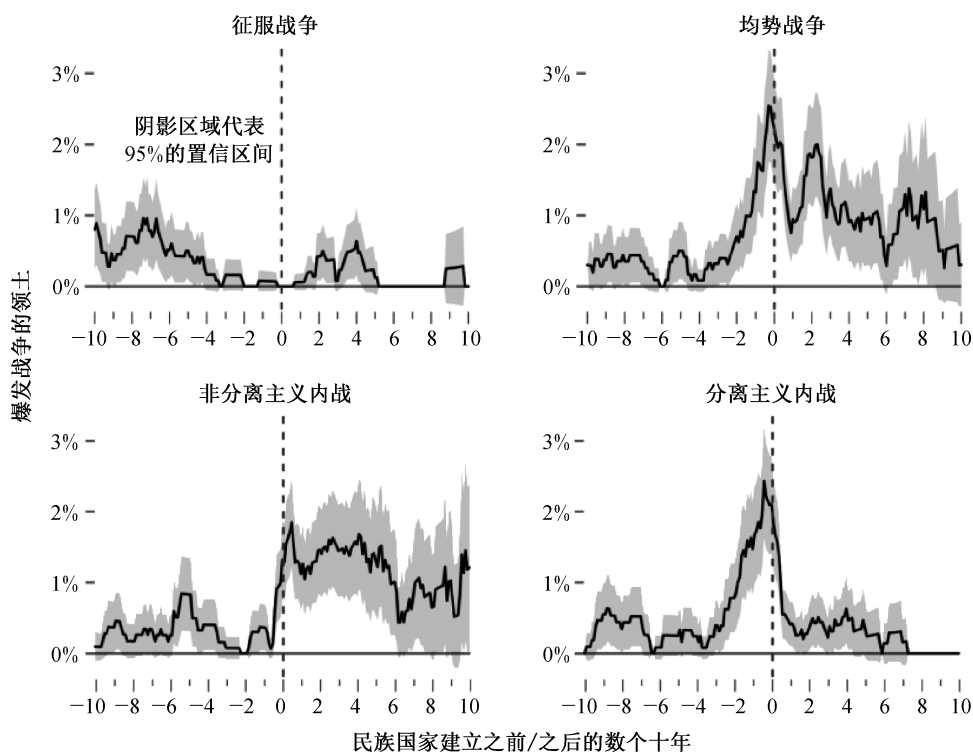


图 2 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战争的类型(平均间隔为十年, 95%的置信区间)

译者注:相关资料由作者提供,并参照中译本,参见 Wimmer, Andreas & Min, Bria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Explaining Wars in the Modern World, 1816–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1, No. 6, 2006; [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战争之波: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与族群排斥》,杨端程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36 页。

征服战争的爆发频次在民族国家形成前已出现显著峰值,这种阶段性特征与帝国体系的扩张周期高度吻合(见图 2)。当帝国积极对外扩张与征服领土时,这类战争爆发最为频繁。统计显示,帝国对特定地区的军事征服行动,平均比该地区建立民族国家早约 80 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族国家形态的确立，征服战争的爆发概率虽然在总体上锐减，但仍存在若干异常波动。在理论模型的理想状态下，这种偏离现象本不该出现。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的扩张构成例外——二者试图以武力兼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领土。相较于 19 世纪前期帝国扩张中的征服战争，这类帝国时代末期的征服战争明显背离了国际主流规范而受到谴责。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在此时已成为世界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原则。

数据显示，国家间战争（均势战争）的发生率在民族国家形成阶段达到高峰。这种现象主要（并非完全）源于对多族群混居区的领土争夺。此类情形下，国家试图根据族群边界重新调整政治边界。

值得关注的是，非分离主义内战的爆发高峰出现在民族国家确立之后。这也揭示出，在帝国统治时期的内战发生率相对较低。异常波动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后的第 80 年、第 90 年及第 100 年，包括在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爆发的冲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冲突并不属于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关注对象。

四、案例一：俄乌冲突

依照以上分析框架，苏联应被界定为“帝国形态”而非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俄罗斯帝国多民族疆域的继承者，苏联地区并未出现典型的帝国崩溃时的大规模分离主义战争。这一现象与多数帝国终结时的解体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乌克兰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却呈现了“谁将控制新独立国家”的族群政治斗争，这与理论模型的推演结论相符。在这场争夺中，乌克兰人（Ukrainians）自视为国家代表与天然的统治者。但是，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名义民族（titular nation）的乌克兰人，究竟应以何种标准界定其民族身份？谁承袭了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代表权，从而应该统治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

与多数后殖民国家相似，两大群体或联盟网络在此展开政治角力，他们都自称“同族”并应该统治“同族”。一方是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接受乌克兰语教育的群体后裔构成。历史上，乌克兰曾被东部的俄罗斯帝国和西部的哈布斯堡帝国瓜分。有些人是在苏联早期民族化政策中，其祖先被同化为乌克兰人的后裔。当时，苏联试图使人口同质化，并传播各加盟共和国名

义民族的语言和特征。另一方是俄罗斯人。他们的祖先在罗曼诺夫帝国时期接受俄语教育，并接受了大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具有亲俄倾向。在苏联后期，随着民族化政策的逆转，国家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也使得乌克兰境内部分人口重建了对俄罗斯的民族认同。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这两个准民族群体(quasi-ethnic groups)或者称“联盟网络”(alliance networks)持续争夺对政权的控制权。这场斗争体现在双方形成交替执政格局的反复较量中，其权力更迭往往伴随选举争议、政变，以及执政当局对反对派力量的驱逐。这类周期性更迭循环直至“广场革命”(maidan revolution)后才告终结。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的最终胜利，“广场革命”导致了亲俄政治精英被全面清除出政府与军队高层。此外，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乌克兰还通过了一部语言法，该法承认欧盟的每种语言都是乌克兰的官方语言，如芬兰语、葡萄牙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却在官方层面选择性地排除了对俄语的承认。这一做法在具有亲俄倾向的政治精英及民众中引发不满，认为这种排斥举措违背了“同类相治”的原则，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裂痕。

乌克兰境内的武装冲突源于顿巴斯地区宣布独立。该区域集中居住着具有亲俄倾向的俄语族群。与理论模型相一致，俄罗斯以保障境外俄裔的平等政治权利为由，实施干预行动：先以保护“受制度性歧视的同胞”为由实现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继而依据类似的干预逻辑升级为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在该案例中，国内族群政治斗争演变为两个民族国家间的军事对抗。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为俄罗斯开展的军事行动提供辩护。“广场革命”后俄语族群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遭遇排斥，仍值得商榷。基于理论分析的核心在于，无论这类排斥是事实上的还是认知上的，在客观上都为他国跨境干预提供了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境干预就是正当的。从宏观历史的维度审视，俄乌冲突实质上是延续了后帝国时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广泛冲突模式。这并非部分观察者所认为的帝国复兴，而更像是帝国崩溃后历史动态的重演。这种动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帝国解体与民族国家形成的过渡期。

五、民族国家中的族群内战

在许多“后帝国国家”(post-imperial states)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族群往往

控制政权，并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合法代表。他们通常会系统性地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群或反对派。对此，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被边缘化群体往往形成“殖民统治”（colonial domination）的认知，进而激化政治合法性危机。

以乌克兰为例，在“广场革命”后，具有亲俄倾向的乌克兰人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这种结构性颠覆导致俄语族群中的民族主义者产生了被“殖民统治”的感觉。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则为少数派统治提供了更加极端的案例。仅占人口10%~12%的阿拉维派通过垄断军队、关键产业及政府高级职位，实现了对国家的全面掌控。因此，绝大多数民众感到未被代表，并将阿萨德政权视为外来压迫者。

族群政治排斥会削弱国家的合法性，并增加爆发族群内战的可能性。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国家至少经历过一次族群内战。族群政治暴力的发生相对普遍，即使不总像叙利亚内战那样彻底摧毁国家。那么，从少数族群统治到较为温和的政治排斥，族群政治不平等将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政治发展代际性的、缓慢变化的因素共同决定着新兴独立国家的权力构型——究竟是走向包容还是排斥。这一过程中，三个长期作用的因素尤为关键。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能力（the capacity to provide public goods）。当政府具备向地方（包括少数民族社区）有效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包括安全、基础设施和法治）的能力时，其作为联盟伙伴的吸引力将显著增强。政治精英可以在不同族群间建立深远的支持网络，而不仅仅是局限在本族群当中。第二个因素体现为志愿性组织的密度（the density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高密度的志愿性团体网络能够构筑全国性政治联盟，并且此类网络与传统庇护主义网络形成显著差异——后者多局限于地域性的利益交换，难以形成跨区域关系。第三个因素是语言的整合（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的存在使联盟网络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覆盖整个领土，实质上降低了多族群沟通的成本，使得多族群、多样化的网络更容易形成并维持。人口的语言同质性越高，政治联盟网络更容易扩散。^①

① 第三个因素也被称为“语言的多样”，参见 Wimmer, Andreas, “Nation Building: A Long-Term Perspective and Global Analy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1, No. 1, 2015.

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志愿性组织的密度和语言的整合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增加了多族群政治联盟形成的可能性。鉴于此，一国执政联盟的构成模式及其政策方案也相应呈现更高程度的族群包容特性。基于 155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威默通过过程追踪法（process-tracing）对三组对照案例展开机制分析，验证了上述要素对全球族群政治包容—排斥动态的实际塑造力。

本文的讨论重心在于族群政治不平等的实际后果而非历史根源，尤其聚焦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族群权力不平等作为内战的主要诱因。

为此，威默等人建构了具有创新性的“族群权力关系”（Ethnic Power Relations, EPR）数据库。^① 这一数据库系统收录了 1945 年以来各国年度政治相关族群数据，并对其政府代表程度进行编码，覆盖从“完全掌权”（如叙利亚阿拉维派）到“彻底政治排斥”（如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连续性光谱。通过将数据集与既有武装冲突数据集结合分析，研究得以有效辨识武装组织（如游击队）的族群身份标签，进而验证特定族群在国家执政联盟中的代表缺失如何催化冲突发生。

数据分析显示（见表 1），当以族群而非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时，其在政府中的代表程度与武装叛乱风险呈现单调变化的趋势。随着代表性级别从最高层次的完全垄断执政（如单一族群掌控政权）逐级递减至完全排斥性歧视，以该族群名义发动武装叛乱的概率持续攀升。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具有地方自治权的地区性族群群体中：虽然该类群体在国家层面缺乏代表，但其在区域层面的代表性降低了暴力冲突的发生概率，他们发动叛乱的可能性最低。

表 1 按群体政治权力地位分类的冲突发生率

群体政治权力地位总体类别	群体政治权力地位具体类别	武装冲突发生概率
在国家层面的 执政联盟中被纳入	在国家政府中具有垄断权	0%（按定义）
	在国家政府中占主导地位	0%（按定义）
	权力分享安排中主要参与方	0.31%
	权力分享安排中次要参与方	0.34%

① 参见 Cederman, Lars-Erik, Wimmer, Andreas & Min, Bria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续表

群体政治权力地位总体类别	群体政治权力地位具体类别	武装冲突发生概率
在国家层面的执政联盟中被排斥	在地区政府中具有代表	0. 24%
	在国家或地区政府中均无代表	0. 60%
	遭受歧视的群体	0. 93%
平均水平		0. 46%

注：相关资料由作者提供，参见 Cederman, Lars-Erik, Wimmer, Andreas & Min, Bria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62, No. 1, 2010。

遭受歧视的群体是一种极端情况，这类群体成员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政党、公共行政部门以及军队之外。在军事独裁体制中，统治者对军队的控制具有决定性意义。需要说明的是，编码判定与政权类型无关，即无论研究对象的政治体制属于一党制政权、军事独裁还是其他类型，特定族群在政府中的代表程度取决于执政联盟的构成。表 1 数据表明，遭受歧视的群体发动武装叛乱的概率达到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必须强调，从政治排斥到暴力冲突的转化需要依赖其他条件，并非所有受排斥的群体都会诉诸武装叛乱。当前理论模型对暴力冲突的预测可能存在高估的情况，因为武装叛乱在现实中仍然相对稀少。

武装叛乱的爆发还需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第一，国家政府采取无差别的镇压政策，持续用暴力压制因权力排斥发起抗议行动的群体。这种镇压行为反而在事实上确立了抗议运动的正当性，并为抗议运动提供了招募追随者的机会，尤其是可能吸引愿意承担生命风险的青年群体参与武装抗争。第二，存在国家安全机构无法有效管控的庇护空间。此类区域为叛乱组织提供了必要的组织空间，包括士兵训练、武装、思想灌输，以及策划军事行动。具体而言，地理阻隔的内部避难所（如山地、丛林）与跨境的外部避难所（即邻国默许或支持叛乱势力的区域）均能发挥作用。威默与林德曼（Stefan Lindemann）合作发表于《和平研究杂志》的论文提供了更详细的案例研究来支持这一论点。^① 通过分析 58 个遭受同等程度政治排斥的族群案例（其中半数出现武装叛乱组织，半数保持稳定），他们发现前文所述的两个条件能够有效解释差异性结果。

① 参见 Lindemann, Stefan & Wimmer, Andreas, “Repression and Refuge: Why Only Some Politically Excluded Ethnic Groups Reb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5, No. 3, 2018。

六、案例二：巴以冲突

在既有的分析框架下，审视当前以色列—哈马斯的冲突具有典型的适用性。尤其应关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群体（包含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地区居民，不包括拥有以色列国籍者）——该群体虽然受以色列政府管辖，但完全不具备公民基本权利。这种状态类似于殖民统治，例如独立前加纳的民众——他们虽然处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在宗主国的政治中心伦敦毫无发言权。因此，被占领土展现出极端歧视的形态，即在当今罕见的准殖民统治状态。类似案例，还可见于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地区，抑或缅甸境内罗兴亚人的境况。

需要明确的是，这类分析并不构成对哈马斯军事行动合法性（部分声援者所主张的“解放战争”性质）的认可。这是一种错误的类比方式：传统反殖民斗争对象始终局限于殖民政权本身（如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其政治诉求并不延伸至彻底摧毁或消灭宗主国本身。相比之下，哈马斯明确主张消灭以色列国家的目标。无论如何，学术解释并不等于辩护，在案例一中同样如此。

在极端歧视的情况下，族群内战爆发的可能性非常高。格莱迪奇（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与波罗（Sara M. T. Polo）的研究已经指出，族群政治排斥和歧视会滋生恐怖主义。^① 在这种情况下，前文论述的条件仍具解释效力：第一，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实施无差别压制措施，具体表现为设置检查站、任意征用土地，以及军方随时进入巴勒斯坦民宅开展军事行动；第二，存在安全机构无法触及的避难所来组织武装抵抗。以色列撤离后的加沙地带成为哈马斯开展士兵训练、武装与动员的隐蔽据点。此前，散居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侨民（the Palestinian diaspora）亦曾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及其分支提供性质类似的场所。

既有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解释本轮巴以冲突的演进态势。军事冲突已经引发周边国家介入，具体表现在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等通过支持其跨境宗教群体，以拓展其区域议程与影响。除了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导致了严重的平民伤亡，这场

① 参见 Gleditsch, Kristian Skrede & Polo, Sara M. T., “Ethnic Inclus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Public Choice*, Vol. 169, No. 3, 2016。

战争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什么意外之处。以往此类严重的平民伤亡规模更可能是由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或全球南方的其他独裁政权造成的。

七、结论与展望

本文旨在阐明民族主义对现代政治世界的深刻影响，它不仅催生了民族国家体系，更重塑了政治合法性的原则。这一进程导致“现代性方案”（the modern project）依循民族界限呈现出分割（segmentation）与分化（splintering）的特征。威默的早期研究已对这一命题作了系统阐释。^①然而，民族主义作为形塑现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变量，其理论地位在经典理论与主流学说中均未获得应有的关注。此外，虽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过去两百年中持续为跨国战争及国内暴力冲突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正如开篇所述，这在当代对战争与冲突的政治学研究中鲜少涉及。

在冷战告终后的世纪之交，西方知识界和政界曾普遍认为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将走向衰退，并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当时的主导性构想是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基础，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来替代传统国家秩序。根据本文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这种期待最终落空是有其必然性的。尽管今天的年轻世代已难以理解这类乐观预期，但它们确实是彼时普遍存在的共识信念。同样，认为自由国际秩序能够遏制或预防民族主义与族群战争的看法也已被推翻。国际行为体所能提供的有限激励举措及其力量难以有效干预族群政治冲突。在此背景下，欧盟是唯一例外：通过数十年的东扩进程，其创造的准入条件使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的政治精英均调整诉求，转向对少数群体更具包容性与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基于反事实分析框架推论，如果没有欧盟的制度约束，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地区可能会掀起新一轮战争浪潮，冲突范围将超越南斯拉夫地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具体区域可能出现类似的族群矛盾激化。

从宏观历史视角来看，族群政治不平等与排斥问题终将消失或得以解决。人类也并非陷入民族主义暴力的历史循环，直至历史的终结。追溯 19 世纪以来全球冲突演变轨迹可见，由民族自决诉求驱动的族群政治冲突往往会逐渐消弭，大

^① 参见 Wimmer, Andreas, *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 Shadows of Modern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约经过140年至160年，族群排斥的态势将趋于消退，族群冲突的发生概率也将处于极低的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消解族群政治不平等与排斥存在四种路径。虽然从当代价值伦理的尺度审视，其中的部分路径或存有争议；但从经验上看，它们正是现代国家族群政治冲突的解决之道。

第一，调整国家边界(adjustment of state borders)。最常见的方式是重新划定政治疆界或建构族群同质性更高的国家。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一做法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这类调整虽往往伴随战争冲突，但也存在非暴力解决的案例。例如，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和平解体，即为典型个例。

第二，族群强制性迁移(ethnic expulsion)，即通过强制迁移手段使少数群体永久迁离历史居留地。该群体通常是长期遭受排斥或歧视的弱势族群，但也可能是曾经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20世纪中叶的印巴分治堪称最具规模、最为悲惨的历史个案，其在短期内造成数百万人口死亡及数千万人口流徙。值得注意的是，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这一现象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仍然存在。以2024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纳卡地区)为例，当地居民被迫舍弃世代生活的家园，经由乡野道路向亚美尼亚境内进行持续性迁徙。在当代，此类场景在镜头前仍真实上演。

第三，权力共享(power sharing)。国家通过扩大执政联盟来调整权力构型，让少数群体加入政府，形成更具包容性的联盟。这是解决族群排斥问题更为自由的方法。在加拿大，原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法语族群成为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也通过《贝尔法斯特协议》(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实现了这一目标。

第四，同化(assimilation)。国家可以通过同化政策调整族群边界，在不变更边界或人口结构的前提下实现整合。具体路径包括，开放族群间的流动通道，使少数族群成员得以加入主体族群并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当这一过程与纵向政治流动相结合时，少数族群不仅能够融入主流族群，更可能进入包括执政联盟在内的社会高层。此类开放性政策形成有效激励，促使少数族群弱化原生身份认同，转而融入主体族群。尽管族群身份标识不会彻底消亡，但其重要性将随时间推移而衰减。法国与博茨瓦纳的实践，均为此类模式的典型范例。^①

① 参见 Wimmer, Andreas. *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民族主义兴起后向全球扩散，并由此引发战争。基于历史经验，人类社会解决族群政治排斥问题主要有四种方式。民族主义虽然是导致国家间与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但并不构成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宿命。若历史可以指引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或许会在某一天迎来因民族主义兴起而引发的战争浪潮的终结。